



孫才新

Sun Caixin

孙才新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专家。1944年12月13日出生,重庆垫江人。1969年毕业于重庆大学。重庆大学副校长、教授,高电压与电工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从事高电压与绝缘及故障诊断技术研究,在电气外绝缘、电气设备在线监测及故障诊断、高电压技术在生物医学工程中应用等方面作出了创造性的成就。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三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2项。获发明专利3项。出版专著4部、译著2部,发表论文280余篇。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44年瑞雪纷飞的隆冬,我诞生在渝东北三县交界的垫江鹤游坪。童年对故乡“蓝天白鹤遨游,地上棋盘为石”境色的迷恋至今流连忘返!在长90里、宽30里的深丘坪地上,遗留至今的石垒寨墙和108个大小寨门,以及分州衙门岩壁上“气死不告状、饿死不当贼”的斗大石刻,是故乡历经沧桑和农家勤劳倔强的写照。我的父母在贫穷中为养家糊口而苦苦挣扎,把改变贫困生活的梦想全部寄托在四个儿子身上,按照家谱“才”字辈,给我们四兄弟取名为“正、高、新、诗”,希望我们成为有用的人,期待着家境的振新。然而,到1950年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全家仍一贫如洗,父亲毅然参加了迎接

解放的共产党外围地下组织,并任解放后的村农会主席,以破庙办起了全村农民翻身作主后的初级小学。

从我家到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四所学校的乡村小路,虽然今天已经变成现代水泥公路,但当年我赤脚求学的足迹仍历历在目:在雨雪交加的寒冬腊月,穿着母亲为我无数次补丁的旧棉衣,赤脚走到初小学校旁的溪沟中,先让潺潺流水把冻僵的双脚洗净,才穿上母亲缝制的粗布旧鞋走进教室;小学六年从未有过午餐,因此上高小的路程虽然只有10余里,但每天放学回家那种饥肠辘辘、路途似乎遥远的滋味至今犹在;初中正值“大跃进”年代,全校师生不是扛木材到离学校100余里的土法炼钢厂就是去附近的生产队割麦插秧,而那时又遇连续三年天旱,农村户户几近绝粮,国家给初中学生的配粮标准也不断减少,母亲却悄悄地把储藏的红薯和咸菜留作我回家补充营养;1961年,我与弟弟同时考上县重点中学的高中和初中部,但农村学生却要自带口粮,因此我和弟弟每月至少要饱尝一次肩挑背扛走100余里山路的痛苦!虽然从初小到高中的“肚皮官司”不堪回首,但练就了我吃苦耐劳的本能;虽然身处生活逆境,反而增强了我求学求知的动力。高考前夕,高中校长以党组织的名义一再要我考北京的名校,但我不忍全家为我读书再过度操劳,报考了离家最近的重庆大学电机系为第一志愿,从而我与重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重大不仅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和“耐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的悠久历史传统,而且“陪都”提升了知名度,云集了一批知名的学者,电机系更有一流的师长,并以治学严谨著称。从僻静的农村初到繁华的山城和宁静的校园,最让我开心的是当时每月12.5元的全额助学金!不仅不再为三餐发愁,而且减轻了父母负重。尽管山城盛夏如火炉、秋冬浓雾缭绕,但除了上课,早上冷水沐浴后长跑,晚饭前打篮球,星期天泡图书馆是我毫不厌倦的作息规律。精

力充沛与学习刻苦使得我每门课程学习得心应手。正当大学之春生机盎然时,校园碧波荡漾的民主湖掀起了惊涛骇浪!1966年春,全年级学生到野战军当兵锻炼两个月后,全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大学“停课闹革命”,学生却成了“造反派”;在“文攻武卫”的硝烟中,“工人阶级宣传队”开进学校占领“上层建筑”对大学生进行再教育,并开始“复课闹革命”;当我们如饥似渴地力图追回流失的大好学习时光时,1969年5月,铁道兵的专列又把我们全年级学生运到金沙江畔的成昆铁路修建工地,接受一年再教育并等待分配。1970年4月,“‘老九’不能走、大学还是要办”的春风改变了我执意到工厂的分配志愿,在彷徨中从洒满汗水的深山峡谷铁路工地走上了大学教师之路。

回到学校被分到机关工作后,时逢首届工农兵大学生即将入学,在“文革”中“牛鬼蛇神”最多的物理教研室老师以我物理成绩好为由,给了我从教的机遇。在当时一批非常优秀和德高望重的老师指导下,我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物理学教材和专著,在理论和实验能力上受到了很好的培养,师道的第一步令我终生受益。1974年秋,当时名师不少、中年教师在学术上异常活跃的电力教研室又以专业基础课成绩不错和无年青教师带实习为由,将我从物理学海洋中捞走。每任一门专业课的辅助,总是先专心听讲,然后阅读相关的多种参考书才去给学生上辅导课;每带一次毕业设计,总是潜心与学生一起去亲手完成;为了增强实践经验,总是主动承担带艰苦的生产实习。虽然在电力系统及自动化专业既当助教又当学生历尽艰辛,但师道的第二步实实在在圆了我高考时志愿选择的梦。

1978年,重大创办高电压技术专业,我被派到西安交大进修,虽再次重蹈学生与助教兼容的苦海,但从讲课、实验到科研的能力都受到了系统培养,师道的第三步是改变我人生的关键!在有幸相继破格晋升副教授和教授后,

1989年秋天被公派到苏联著名的列宁格勒工业大学访问研究一年,更为幸运的是由我的恩师顾乐观教授攻读副博士时的导师、著名的高电压技术专家、副校长阿列克山德洛夫院士亲自担任我的指导老师,直接参与他领导的特高压输电外绝缘和超高压交流紧凑型输电技术的研究,他不断创新的学术思想和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对我影响至深至酷。

从创办专业起,我们一直坚持走“产、学、研”结合、快速提高办学水平的道路。在学校经费投入十分有限的困难条件下,依靠自己承担的科研课题费投入和企业的支持,我带领团队建成了在国内外都具有显著特色的高电压与电工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西电东送、南北互供、全国联网”的电力发展战略,注重开拓与交叉融合,不仅在复杂环境中的外绝缘、电气设备在线监测及故障诊断、脉冲功率技术在生物医学中应用等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而且更为难得的是在艰苦创业中自然形成了催人奋进的和谐创新团队,展现出创造强势的活力和后劲。在从师30余年中,我没有任何节假日,也没有星期天,常常是在实验室工作到深夜。1996年从一直在科研、教学第一线工作的普通教师走马上任系主任,1997年被任命为分管财务、人事、离退休工作的校长助理并于1998年任副校长,相继还分管过审计、科技产业、科研工作。从担任学校管理工作起,直到2004年底离任,每天的生活轨迹由原来的家、实验室变成了家、校办、实验室,虽然白天的时间全部奉献给了行政管理工作,但每周到实验室工作的时间却超过40小时。八年的“双肩挑”虽然倍加辛苦,但高电压与绝缘技术学科建设跨入国内前列的振奋、学校财政很快从负债运行步入良性循环的喜悦、同舟共济的机关同事对与我共同奋斗时光的依恋,常使我乐趣无穷。当然,既要献身于学术又要对学校党政委任的管理工作尽责开拓,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教师一样生活!

我的夫人吴绍琪,生于上海,长于雾山城,曾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和教师生涯丰富了我们的共同话题;恢复高考后她从工厂考入西南师范大学时,恰逢我到西交大进修,她狠心把不到1岁的爱子智勇交给从“牛栏”“解放”后恢复工作的父母照看。大学毕业分到重大后,她除了繁忙的行政和教学工作外,还要为小家和远在故乡的父亲及大家庭操劳。在我任副校长后,她主动辞去校学生工作部副部长职务,到贸易与行政学院当普通教师,不仅默默地承担孩子的教育,而且倾心支持我的工作;凭自身的不懈努力,不仅晋升教授,而且被学生评为全校讲课最受欢迎的十佳教师之一。直到孩子工作并考上博士生和我从学校管理岗位退下后,晚饭后我们才终于忙中抽空可以在民主湖畔悠闲散步!

令我永久遗憾的是,生我养我的慈母在我

大学毕业前就因劳累成疾而早逝,未能尽赡养之责,深感内疚!

进入21世纪后,我倾力对团队的年轻人从学术、师德、管理能力等不同层面进行培养和扶植,让他们担纲我辛苦创建的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并竭力推荐学术与管理能力都较强的年轻人走上“双肩挑”岗位;为了发挥年轻人的创新思想,而今我对实验室建设和学科发展不再轻易发表意见,而着力为年轻人开拓新的研究方向鸣锣开道。看到团队中年轻人职称和职务的晋升并没有各自为阵,反而使团队坚如磐石,我又欣然踏上了我一直追求的团队特殊风格的艰难征途,把远大的学术抱负和追求利润紧密结合,将科研成果产业化,打造为学科建设再上新台阶和团队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实平台。